

歷史上的俄國與經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柳若梅*

摘要 在中外交往的歷史上，俄國與澳門雖相距遙遠，但俄國與澳門間接或直接的往來卻時有出現，特別是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之間的關係，是歷史上中俄關係中的非常重要的線索，也可稱得上是俄國認識澳門的起點。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往來，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知識交流的重要一筆。在俄羅斯人初入北京之時，這些天主教傳教士一度是他們了解周圍環境、學習中國語言和在華順利生活的依靠。在清朝禁教的十九世紀天主教沒落之時，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最後可託付對象。兩者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歷史上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中國與歐洲關係史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俄國；東正教；天主教傳教士

俄國地處朔方，偏於歐洲之東，與中國接壤，自十七世紀始與清代中國開始正式交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前其在華活動範圍不超過北京，邊境貿易則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禁止往他處貿易，¹往來清朝的使臣及清俄事務由清朝理藩院主理。澳門地處華南，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成為歐洲諸國與中國往來的必經之地，商賈雲集，盛景非凡。儘管俄國與澳門相距遙遠，但歷史上兩者相互往來聯繫卻時有出現。明確歷史上俄國與澳門的關係，不僅對於這兩個主體各自在歷史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來說十分重要，對於理清歷史上俄國、澳門在中國與歐洲交往中的位置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國

關於澳門的最早記錄來自1675年出使北京的俄國外交官斯帕法里從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處所認識的澳門。實際上，自十七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中期，俄國方面與經澳門入京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往來密切，形成了俄國與澳門的間接關係。

一、俄國來華使節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從1675年俄國外交使臣斯帕法里出使中國起，俄國來華使節直接接觸到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北京的耶穌會教士。換言之，俄國來華使節與中國的溝通主要通過北京的耶穌會士進行。斯帕法里出使之前俄國沙皇賦予的使命之一，便是“力求在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將中國早期給俄國的四封中國公函譯成拉丁文，因為在莫斯科過去沒有、現在仍沒有中文翻譯，以致俄國大君主對中國朝廷當時的

*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5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歷史上的俄國與澳門”階段性成果。

要求至今仍無所悉。”² 1676年5月15日，斯帕法里使團到達北京。理藩院侍郎立刻前來問候，後來尚書本人隨同耶穌會教士南懷仁也趕來問候。“他來到後，和使者互相寒暄，使者從面孔看出他是什麼人，於是開始講拉丁語，問他是不是耶穌會士，在這裡住了多久？他也同樣用拉丁語回答，並且因為我們交談和彼此之間能夠理解而感到很高興。”³ 斯帕法里在北京與清朝理藩院大臣的首次交談在南懷仁翻譯之下得以暢通進行。在談話中，南懷仁不失時機地對斯帕法里表示，“看在基督的份上，他樂於替沙皇陛下效勞，樂於幫助做各種事情……他感到遺憾的是：這樣享有盛名的君主派出使團前來，而中國人則如此野蠻，對任何國家的使臣都不尊重，就像前些年接待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一樣。而且他們把外國送給他們的禮品稱做貢品，寫作貢品，在他們的國書中作答的語氣，就象老爺對奴才一樣，還有許多別的侮辱人的事，以後會告訴我。”⁴ 斯帕法里在京期間，耶穌會士南懷仁擔任翻譯，使團抵達後的安置接待、覲見康熙皇帝禮儀的演練、康熙御前應答、與清政府談判回覆文書的傳達等，都通過耶穌會教士進行。耶穌會士問中國皇帝，他們是否可以拜訪俄國來使，皇帝答不必去拜訪，隨中國官員是因為把他們看成是中國官員一樣的皇帝的人。儘管清廷不希望耶穌會士與俄國使臣單獨會面，但是南懷仁與“另一個老耶穌會士”還是與斯帕法里“談了很長時間，談了許多話”，耶穌會士入華、入京的艱苦過程，在清廷屢屢感覺到的屈辱，溢於言表，最後甚至希望“願上帝給他們一次機會，讓沙皇陛下的軍隊來證明一下，沙皇陛下和他們之間的高低。”⁵ 在斯帕法里使華之時，蒙古頭人根忒木爾背叛清廷逃往俄境，請俄方交還根忒木爾是清朝多次向俄方提出的確保兩國正常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俄方一直百般推諉，拒不交出逃人。對於中俄之間的這一敏感問題，在耶穌會士與斯帕法里之間的談話中也有所涉及：“耶穌會士秘密對使者發誓說，柏格德汗有這樣的意圖，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忒木爾，他將不惜用武力把根忒木爾弄回來，並且要去攻打阿爾巴津

和涅爾琴斯克這兩個邊境城堡，因為現在他們對沙皇陛下方面異常疑懼，特別是這次通過我們獲悉，俄國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諭旨在那裡定居的，而原先他們以為那些俄國人是做生意移居的，像以前沿阿莫爾河居住那樣，可以隨時予以殲滅。此外，現在他們知道，那些城堡裡人數很少，離莫斯科很遠，而離他們較近，他們想趕在邊界軍隊增加之前先發制人，他們急需的不是抓回根忒木爾，而是要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圖……如果沙皇陛下不願引渡根忒木爾，那就必須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因為中國人自己也感到驚訝，這麼少的人怎麼敢駐紮在他們這樣的大國邊境。他們這些耶穌會士就像為上帝服務一樣，樂於替大君主服務，因為他們不喜歡滿洲人，他們喜歡漢人，他們在漢人時代生活得更好。”⁶ 斯帕法里回國後撰寫的《中國漫記》⁷ 中的信息除去北京的親身經歷外，其餘幾乎全都來自耶穌會傳教士。斯帕法里回國之際，南懷仁還請求致信俄國沙皇一封。信中除稟告斯帕法里在北京得到中國皇帝的隆重禮遇外，還請求俄國沙皇眷顧自己以及整個耶穌會，同時將自己的天文學著作上呈俄國沙皇。耶穌會教士不僅在康熙御前為中俄溝通效力，還曾為康熙皇帝轉達致俄國沙皇的信。⁸

1686年俄國新皇登基後派兩名專使——維紐科夫和法沃羅夫到北京向康熙皇帝傳送求和國書，兩名專使在北京覲見康熙時由葡萄牙耶穌會教士徐日昇和南懷仁居中翻譯。⁹ 兩人在離開北京之際前往南懷仁處告別，雖未得以相見，但其屬下人員卻將一些重要信息透露給他們：“柏格德汗願意與俄國大君主友好相處，希望見到戰爭平息下來；阿爾巴津城決不能留給俄方；中國沒有工程師，大炮和榴彈是耶穌會教士維爾比斯特在兩名俄國人的幫助下鑄造成的；柏格德汗的步兵團為數不多，而且未經戰陣；荷蘭人曾經前來請求在中國設立商務機構，遭到拒絕，且不許再來；柏格德汗本來有意派本國使臣前往俄國，但被他的近臣勸止，理由是中國朝廷從未向任何國家派過使節，又說柏格德汗曾經讓耶穌會教士佩雷拉給大君主帶去一封書信。”¹⁰

中俄尼布楚談判由耶穌會士徐日昇、張誠居

宗教大觀

問翻譯，1689年8月1日雙方代表到達尼布楚，三天之後，耶穌會士派人給俄方送來密信，提醒俄方謹慎行事，方能達到談判目的：“只提醒閣下在來函中常常淡然提及，但我認為似乎是嚴重疏忽的事情：佟國綱是皇舅，又是皇帝的內兄，官高位尊。索額圖是領侍衛內大臣，大於一等公；論官階雖然不可與之相埒，但他卻高出於他人之上；其他的人，特別是歐洲人都尊敬他，因此，特提醒閣下注意。最後，我想請閣下對異族人能施予特殊仁慈，對和我們同道的基督教徒加以愛護將會大有裨益，不要以為不按基督教義對待異族人，可以獲致善果。尼古拉·加弗裡洛維奇先生¹¹來此時，以恩主自居，表現了許多姿態；若不是我加以勸阻，他還會做出更多的這種事體。”¹² 會談進行得艱難，雙方幾近陷入僵局，其間耶穌會士暗暗對俄方人員說，“會談期間有中國人在場時，要少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受到猜疑，似乎已經對他們不甚信任。”¹³ 談判略有進展之時，“耶穌會士秘密告訴安德列·別洛鮑茨基，望全權大使速將最後意圖告知中國欽差大臣，看來耶穌會士期望得到大君主的恩典，將促使中國使臣議和。否則，中國使臣不諳禮儀之邦的慣例，頗有大動干戈之意，他們永遠也不肯把邊界劃到結雅河。安德列·別洛鮑茨基奉全權大使之命，秘密告訴耶穌會士，他們二位如此熱心效力，定能獲得大君主的恩典。但全權大使決不害怕戰爭。現在耶穌會士可以給他安德列留下一名親信，以便他與他們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訊息。耶穌會士說，現在不能留人，因為這樣，中國使臣對他們已經發生了懷疑，等以後雙方願意談判時，再如此行事。無論如何不能從國庫撥出物品私下派人饋贈耶穌會士，原因是怕引起中國欽差大臣對全權大使的懷疑。”¹⁴ 俄方也試圖通過居間翻譯的耶穌會士達到目的：“雙方就此項要求進行了十四天的激烈爭論，隨時都有破壞和平和用兵動武的危險。陷於此種不快境地的俄國使臣只好求助於同中國使臣在一起的耶穌會士居間調停。他們又是請求，又是送禮，打動了耶穌會教士去說服中國人改持和解的態度。”¹⁵ 談判結束後，俄方人員與耶穌

會士之間又有秘密交往：“耶穌會士走出帳幕以後，曾秘密地交給安德列·別洛鮑茨基一封用法文寫的信。並且在遞信之後，留下自己的一個人。信中請全權大使給予賞賜，令留下的那個人給他們帶來貂皮、銀鼠皮（數量請便），做帽子的黑狐皮、美酒、母雞、牛油；他們相信能得到全權大使的恩典。同是今晚，耶穌會士留下的那個人給耶穌會士帶加一封信及從皇庫中提出的下列物品：四十張貂皮，價值八十盧布；一百張銀鼠皮，價值十盧布；一張褐狐皮，價值十盧布。另外，全權大使、御前大臣、勃里斯克總督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戈洛文本人還贈送了一張黑狐皮，價值五十盧布；四十張銀鼠皮，價值四盧布；半普特牛油；十五隻母雞；一桶燒酒。還派了兩名哥薩克將那個人護送到中國崗哨。”¹⁶

中俄尼布楚條約以中俄邊界問題為主，俄國最關心的俄中貿易問題未有實質推進，為此，俄方希望了解清政府對中俄貿易所持的態度，了解中國市場需求。為此，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向清朝派出了以伊茲勃蘭特為首的使團。伊茲勃蘭特使團在京期間，應耶穌會教士的邀請，經康熙皇帝恩准，還參觀了天主教南堂：教堂建築精美，內部陳設華麗，陳列館裡擺滿了從歐洲搜集的各種珍品，最後耶穌會教士們還宴請了俄國使臣，各式極為精美的點心和糖果、教堂裡自己釀制的葡萄美酒，使俄國使臣在這裡逗留了很久，最後騎馬盡興而歸。¹⁷ 莊嚴華美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經俄國使團的記錄為歐洲和俄國所知。

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卡爾梅克的圖理琛使團回程時帶回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據隨使團來華的勞倫茨·朗格的日記記載，隨東正教使團在京期間從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那裡得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¹⁸ 1719年俄國派近衛軍大尉伊茲馬伊洛夫為特命使臣前往北京。該使團於1720年11月18日抵達北京，1721年3月2日從北京啟程返回俄國。使團成員中的勞倫茨·朗格和隨團醫生約翰·貝爾留下的筆記記錄他他們在京近四個月的時間的生活，自然是北京的耶穌會士居間翻譯，但除公務活動之

外，兩者之間的交往依然十分頻繁。如1720年12月8日，俄國使團成員在天主教南堂與北京的全部耶穌會士約10-12人共進晚餐，餐食豐盛，餐後耶穌會士又陪使團成員前往康熙皇帝的馬廐觀看熱帶動物大象表演。¹⁹ 1721年2月9日，巴多明、馮秉正²⁰（Demail）和穆敬遠（Moran）三位傳教士前來俄國使團駐地表達問候。2月12日，又由中國皇帝出資，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宴請俄國使團在天主教西堂用餐，餐宴由巴多明主持，奢華隆重，康熙的樂隊餐間演奏伴餐。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又陪同俄國使團成員一起觀看了雜技表演和翻筋斗表演。²¹ 2月16日，朗格和貝爾一同前往天主教東堂拜訪了德國傳教士費隱和戴進賢。²² 三日之後，兩人又一同前往法國天主教堂拜訪，當時羅馬教廷特使嘉樂來華，大部分傳教士前往朝廷參加康熙皇帝與嘉樂的會面，他們在北堂只遇到了白晉。²³ 2月21日巴多明神父還為俄國使團送來禮物——一條大鱈魚和一些阿莫爾河打來的新鮮魚。俄國使團即將離開北京之際，又前往幾個天主教堂與耶穌會士話別。²⁴

俄國使團於1721年3月2日是從北京啟程返回俄國的，勞倫茨·朗格則作為俄國商務代表駐留北京。出於為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創造機會的目的，朗格在3月19日、20日拜訪了一些商人和傳教士，由於朗格外出時有清朝兵士相隨，這使所拜訪的商人和耶穌會教士非常畏懼，耶穌會士說，他們的朝廷官員身份使他們處在與常人不同的立場上。因為自己的外國人身份，所以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謹慎，以免被懷疑。²⁵ 朗格此行並非其首次來華，在北京耶穌會士中有與之交往密切者，曾多次派僕人前往朗格住處問候，但都被守門的清兵攔回。他告訴朗格關於清廷的不少內情，說中國的許多位高權重的大臣都不同意朗格繼續留京，但由於皇帝贊同之意已決，所以這些官員只好順從，他們會逐漸接受朗格留在北京這個事實。他建議朗格，一旦出現有利於俄國的時機，朗格就應該立即採取措施。²⁶ 1721年8月14日，馬上就要進入中國領土的俄國商隊隊長伊斯托普裡科夫給朗格寫信，希望朗格幫助他從理藩院借銀2,000兩，並保證俟商隊一在北京

貿易便立刻償還。理藩院認為，雖然前有此例，但俄國商隊不應再次提出類似請求攪擾清廷。適逢此時正在承德避暑的康熙皇帝希望見到朗格，於是朗格攜翻譯、僕從於21日趕到熱河。在熱河，朗格很快與隨行康熙皇帝的耶穌會士會面，得知康熙皇帝準備讓俄國商隊暫時駐紮在張家口附近的沙漠，待聖上班師回京後俄國商隊再進京，因為當時許多朝廷官員都在熱河，商隊即使抵達北京也無法開展貿易。朗格認為禮部尚書大人如此安排是擔心收不到俄國商隊將要送給他的禮物。但如果商隊照此駐紮沙漠，則定會飽受嚴寒和饑餓，還可能導致人員和大量馬匹死亡，所以朗格對此提議非常抵觸。很快事情出現轉機：禮部尚書突然奉旨來訪請朗格為幾位要過境俄國的中國官員簽發通行證。朗格以此為契機周旋，使俄國商隊直接進入北京。借銀問題，也在葡萄牙耶穌會士穆敬遠牽線之下，得到康熙皇帝的第九子饋贈的1,000兩。²⁷

十八世紀初期，中俄邊界摩擦依舊不斷，中國要求俄國歸還蒙古逃人也未得到俄方的回應，於是清政府和俄國斷絕了一切信函往來和貿易關係。於是俄國委派四等文官薩瓦·弗拉季斯拉維奇伯爵為特命全權使臣出使中國。該使團於1727年10月21日抵達北京，11月4日得以覲見雍正皇帝，耶穌會教士巴多明隨侍在側，此行薩瓦與巴多明結為至交，並在巴多明的幫助下結識內閣大學士馬齊，從而使恰克圖條約有利於俄國。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依約派往中國的俄國商隊的隊長勞倫茨·朗格得到北京的耶穌會教士贈送的漢語和滿語書8套計82本，這些書成為彼得堡科學院漢語和滿語藏書的開端。²⁸

二、彼得堡科學院北京天主教傳教士

彼得堡科學院早期的中國書籍收藏與北京耶穌會教士之間的聯繫遠不止於此。1730年，彼得堡科學院院士拜耶爾出版了《中國博覽》（Museum Sinicum）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實際上該書中的很多內容都與由1715年起多次出使北京的朗格、

宗教大觀

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相關。拜耶爾在1730年與正在籌備第二批赴華商隊的朗格會面時還得到朗格贈送的一把中國尺子和一些關於中國長度、重量單位的資料，《中國博覽》中的西歐、俄國、中國長度重量單位對照表就是以這些資料為基礎撰寫的。1731年9月1日拜耶爾寫給北京耶穌會士的信、贈送給他們的《中國博覽》和德國天文學家基爾赫的《天文學觀測選編》，都在朗格帶領第二批俄國商隊（1732年3月22日至9月8日期間在京）進京時轉交，宋君榮於1732年7月3日寫了回信，回答了拜耶爾關於中國的天文學書籍、中國的曆法、耶穌受難日食相關的問題，介紹了北京的法國傳教士在中國語言、歷史的翻譯與研究方面的工作，也表達了他們對歐洲學術資訊和歐洲消息的渴求。²⁹ 此次朗格返回俄國時回國時帶回了耶穌會士宋君榮、戴進賢、巴多明、嚴嘉樂、徐懋德寫給拜耶爾和德利爾的一批信件，為科學院圖書館帶回了北京出版的中文書，其中包括巴多明的漢拉字典和《海篇》、《字彙》。³⁰ 1734年9月，朗格來到科學院提出可以幫助科學院同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建立通信聯繫，溝通學術信息。在當年10月4日的《彼得堡消息》（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刊登了相關的消息。曾任駐中國商務代表、即將帶領第六批商隊前往中國宮廷的朗格在造訪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對那裡的中國物品一一進行了說明，同時仔細查看缺少哪些物品，所缺少的物品在此次赴華時將得到補充。然後朗格到了科學院大會，會上德利爾教授比較了科學院原有的中國地圖和朗格帶回的中國地圖，而拜耶爾教授則研究了朗格帶回的中國書籍。此後地圖交給了德利爾教授，書籍則交給了拜耶爾教授。最後科學院成員與朗格一起商議了與在北京的三個耶穌會（傳教團）就學術事務通信，並確定了這一點，這對於傳播學術、對於豐富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館藏能有不少的幫助。

在1731年至1777年間，彼得堡科學院通過俄國往來中國的商隊和使團，一直與北京耶穌會教士保持著通信聯繫，兩者間互通資訊，交換書刊，更

有北京耶穌教士的文章在彼得堡問世，如彼得堡科學院的刊物《彼得堡科學院通訊》（Novi Commentarii）上先後刊登宋君榮³¹、劉松齡³²、金濟時³³、韓國英³⁴的文章；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合寫的文章發表於拜耶爾的《中國的時間和時間週期》³⁵一書中；宋君榮³⁶、湯執中³⁷分別有文章發表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彼得堡的書刊中。除上述在彼得堡問世的文章外，目前在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喀山大學圖書館藏有巴多明關於中國醫學的文章³⁸和關於中國生活習俗的文章³⁹、宋君榮關於1735-1736年間北京天文觀測的文章⁴⁰和關於中國歷史年表一書的文章⁴¹、蔣友仁翻譯成拉丁文的《尚書》（Chou King書經）、韓國英1772-1777年間寄來的4篇文章，⁴²另外還有宋君榮的北京地圖。每次從北京帶回的信件中先後有宋君榮、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劉松齡等北京耶穌會士繪製的天文觀測圖和地理圖。⁴³ 彼得堡科學院方面向北京耶穌會發出信件的有12人：拜耶爾、德利爾、杜維爾努阿、阿姆曼、裡赫曼、克拉特岑什泰因、蓋賓什特列依特、采依格爾、魯莫夫斯基、米勒、格梅林和克拉什寧尼科夫；北京耶穌會士向彼得堡發出信件的有17人：巴多明、戴進賢、嚴嘉樂、徐懋德、宋君榮、孫璋、陳善策、傅作霖、劉松齡、湯執中、魏繼晉、蔣友仁、方守義、楊自新、錢德明、韓國英、金濟時。這些信件所使用的語言有拉丁文、法文，內容涉及漢語和滿語、中國歷史和文學、天文學、地理、醫學、物理和自然史。⁴⁴ 除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保持通信外，彼得堡科學院主席、科學院秘書也曾與北京耶穌會士通信，信件內容涉及交換圖書、交換植物種子、推舉宋君榮、劉松齡、韓國英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院士等。根據《彼得堡科學院會議記錄》記載以及學術界的發掘情況判斷，通信應有約145封，但目前保存可見的只有85封。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和書刊交換，豐富了彼得堡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中國圖書和中國物品，豐富了北京耶穌會士圖書館的歐洲和俄國書籍，豐富了他們關於歐洲學術界的資訊。

三、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正如第八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1794-1807年在京）團長所言，⁴⁵ 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注冊都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交往。由於中俄關係十分不穩定，俄國商隊時常因中俄邊境的糾紛而被禁止進入中國，每逢此時，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團人員就處於與俄國隔絕的狀態，無法得到關於俄國和歐洲的任何消息。長期在北京生活、在宮廷任職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於俄國東正教使團人員來說，既能了解到北京宮廷和歐洲的必要信息。同時遠離祖國之中北京耶穌會士與他們同屬於基督教世界的身份、甚至耶穌會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會令俄國駐北京東正教使團人員感到慰藉。第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列紮依斯基抵達北京後，與天主教神父馬國賢互相拜訪來往，馬國賢日記中記載，“這位院長的舉止莊重而威嚴，服裝和陳設都異常地整潔。當他走出教堂的時候，胸前佩戴著十字架，手中拿著主教的權杖。”⁴⁶ 列紮依斯基明確向馬國賢表示自己沒有指望能給中國人洗禮，只為俄俘的後代的宗教生活服務，這與彼得一世對入華東正教使團的諭令完全一致。甚至為了不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在馬國賢面前甚至“裝得像個天主教徒”。後來貧困潦倒時，列紮依斯基依然是“想去走訪那些耶穌會教士”。⁴⁷ 第五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去世後，北京的耶穌會士操辦葬禮安葬，安放墓碑，並在墓碑背面刻上了中文的祭文。⁴⁸ 百年後的北京，在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式微之時，俄國東正教使團一方面顧及清朝對天主教的態度而不敢過多表現出對天主教傳教團之間友好關係，另一方面畢竟以往所得到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團的幫助，且與天主教同屬基督宗教，對北京天主教的態度非常微妙。儘管如此，在德天賜事件中，天主教逢絕處之時，清政府因為懷疑所有的天主教傳教士而將德天賜的信件被交給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索夫羅尼格裡鮑夫斯基以了解其內容。危難之時索夫羅尼藉口不太懂信件所寫的語言，婉言拒絕解讀，從而使信中涉及的那些傳教士免於牢獄甚至滅頂之災。⁴⁹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的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摘錄編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⁵⁰ 1816年在比丘林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的心得。⁵¹

天主教傳教士自明末便在中國宮廷任職，東正教傳教士入華後在中國語言、歷史文化學習以及基督教傳播的過程中，較多地採用了天主教傳教士積累下來的相關成果。早在彼得堡科學院成立之初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馬若瑟的漢語語法書、漢語詞典已為俄國人所知。⁵² 1729年到達北京的第二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曾將耶穌會士編寫的漢語學習資料帶回俄國，這份資料後又交給了1744-1755年在京的第四屆使團，使團成員抄寫複本並依之與當地居民交談，培養了語言能力。⁵³ 1733年俄國駐北京商務代表朗格曾去理藩院請求允許學習漢語和滿語的學生盧卡·沃耶伊科夫把巴多明神父的法漢詞典譯成俄語。⁵⁴ 1781-1794年間在北京的第七屆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安東·弗拉德金曾抄錄耶穌會士所編漢拉詞典。⁵⁵ 在俄國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在俄國大量發表關於中國的論著之前，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記述是俄國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論著和詞典了解中國的語言和歷史文化，也是不少在京東正教傳教士的選擇。他們所留下的漢語拉丁語詞典，也不免借鑑在京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現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藏有第九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以及第八屆、第十屆使團成員編纂的多種拉丁語漢語詞典，在這些詞典的編纂過程中，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定是重要的參考資料。⁵⁶ 處理畢學源身後財產的魏若明神父本人，就翻譯過法國傳教士編的漢語詞典，用於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的漢語學習。⁵⁷ 即使天主

宗教大觀



圖1·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得堡）（OP, ф. 1272, No.18）

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之間依舊保持著新使團到京後相互拜訪的傳統。在俄國第九屆、第十屆使團交接之時，1821年4月18日，北京的葡萄牙主教畢學源向俄國東正教使團駐地派出四輛按中式裝飾精美整齊的四駕馬車，接俄國東正教使團全體成員前往天主教南堂做客（實際只有新舊兩位使團團長、監督官、主要隨行人員得以前往），參觀南堂後，主客把酒相談，興致不盡。⁵⁸ 1830-1831年

間第十屆、第十一屆使團交換之際，畢學源主教再次邀請俄國客人到南堂做客。主人仔細準備餐食甜點咖啡，並正裝陪餐，顯示出招待之隆重。主客暢談歐洲、俄國、中國時事，坦誠相見。⁵⁹ 護送第十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前往北京的哥薩克衛隊長切列帕諾夫（С.Черепанов）受命摹畫北京的東正教堂。畢學源有感於此，請求切列帕諾夫摹畫天主教南堂。1831年4月4日，切列帕諾夫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北京天主教南堂：



今天一大早我便滿懷驚奇地看到了這所寬大的教堂：竟有幾排淨室，教堂高大。這是一座歐式建築，正面聳立著兩座高達二十俄丈的高塔，是全北京最高的建築。走上教堂的高處需要穿過教堂。教堂的牆上裝飾著精美的聖史圖畫，全都保持得那樣潔淨完好……登上唱詩班位，我停在損壞嚴重的風琴前。據說，風琴剛剛安裝好時，聲音傳遍教堂周圍的整個地區，引來好奇的人群，

導致街上水泄不通，甚至巡捕都趕來阻止彈奏。有人說，聖樂對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有很大影響……最後我登上其中的一座高塔：整個北京盡收眼底！四個方向無一不望……然後我環繞教堂的花園、側翼，共有75個單獨的建築，每個又各有十間或更多的房間。可現在這麼一個大園子裡卻只住著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這種空曠造成一種令人至死的愁悶，令人不免憂鬱——基督教不能進入這個國家，這不免令人垂淚。⁶⁰

切列帕諾夫為畢學源摹畫的北京天主教南堂、天主教墓地的水彩畫現收藏於俄羅斯聖彼德堡的國家圖書館。（圖1、圖2、圖3）

在北京慘淡經營的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來往、接待他們來教堂做客成為生活中的愉悅之事；至天主教在華傳播難以為繼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適逢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京（1830-1840年間在京）。畢學源生前委託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魏若明處理身後財產。魏若明將這一託付作為一件莊嚴要事，依約處理天主教遺留資產，依約將所得錢款寄往澳門，雖後來在東正教使團內部和俄國外交部亞洲司風波頻發，仍舊不負所托。⁶¹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的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摘錄編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⁶² 1816年在比丘林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的心得。⁶³ 1795年起，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開始建設自己的圖書館。在1821-1830年間，修士大司祭彼得（第十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全力收集北京耶穌會士翻譯撰寫的漢語、滿語、蒙語基督教書籍，在豐富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的同時，也為彼得堡的亞洲博物館、外交部圖書館和俄國的

宗教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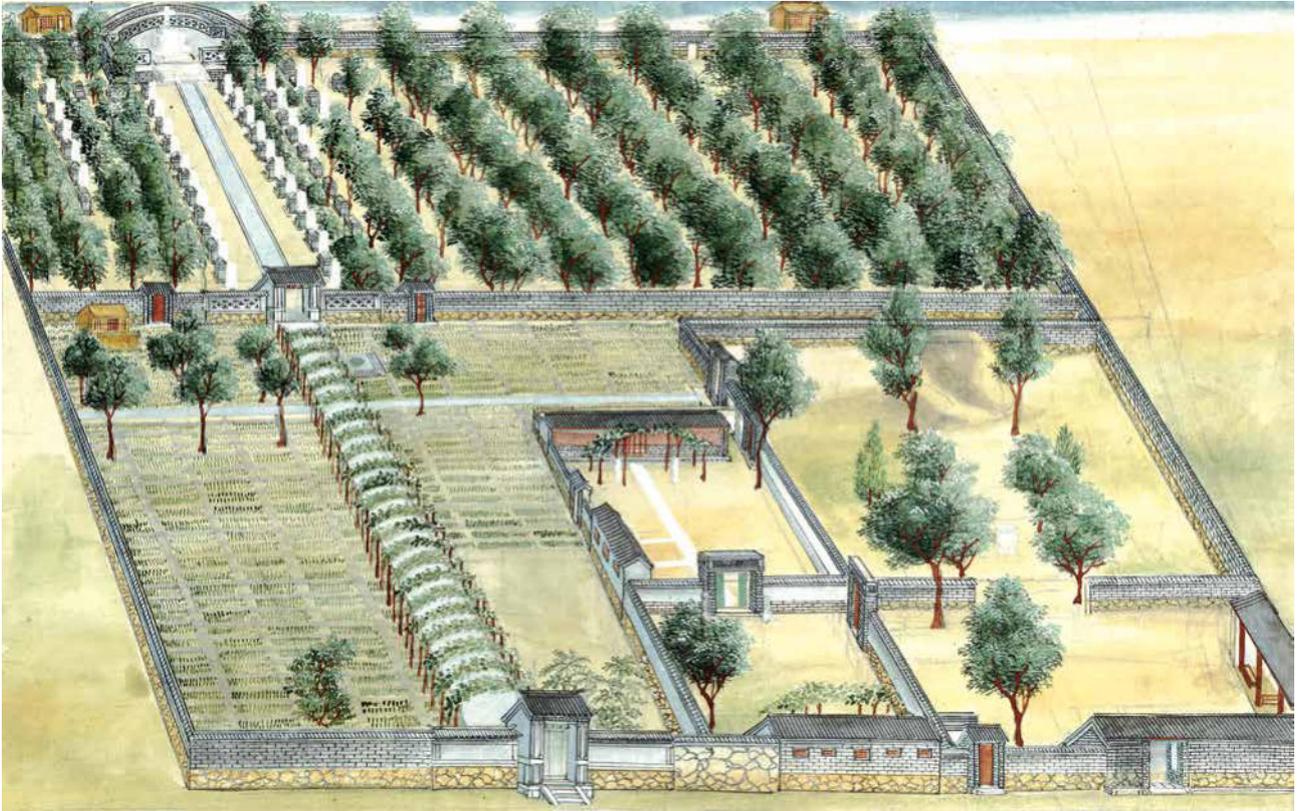


圖2 · 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一，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得堡）（O P, ф. 1272, No.19）



圖3 · 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二，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得堡）（O P, ф. 1272, No.19）

一些大學圖書館購買了不少，目前仍是俄羅斯相關圖書館的珍貴館藏。

結語

俄國自國家建立百餘年起便從東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強制性地將之確定為國教，成為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員。十七世紀俄國向清朝首次派出外交使節時，曾在歐洲多國任職的斯帕法里了解天主教在華已發展百餘年，並在出行之前就計劃必要時在北京尋求天主教傳教士的幫助。斯帕法里之行成為俄國認識中國全境的重要起點，也是俄國了解澳門的起點，也是俄國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往來的起點。1725年正式開辦的彼得堡科學院，邀請歐洲最重要的學者前來任職以培育和帶動俄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利用俄國商隊從北京帶回的資訊展開研究，他們與經由澳門來到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的通信、圖書交換，彼得堡科學院邀請北

京的耶穌會傳教士擔任通訊院士，是中國、俄國與歐洲之間的知識、文化深入交流的體現。儘管自十一世紀基督教教派分裂後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基督宗教內部分屬於水火不容的東方教派和西方教派，但俄國在向清朝派出東正教使團之時，天主教已進駐北京百餘年、天主教傳教士入主清朝欽天監。俄國方面因此憚於天主教在清廷的地位而在選派人選時特別注意挑選擅長周旋人際事務者，並明確要求駐華的東正教教士要與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協調友好關係，爭取他們的幫助。東正教入京之初天主教在華傳播已成規模，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東正教使團扶持幫助；十九世紀天主教在華沒落之時，北京的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依託和慰藉，兩者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歷史上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中國與歐洲關係史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註釋：

1. 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第四款：按照所議，准其兩國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數仍照原定，不得過二百人，每間三年進京一次。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者，在色楞額之恰克圖、尼布朝之本地方，擇好地建蓋房屋情願前往貿易者，准其貿易。周圍牆垣柵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稅。均指令由正道行下，倘或繞道，或有往他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見《中俄邊界條約集》，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13頁。
2.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爾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2頁。
3. 此處“他”指南懷仁，“使者”指斯帕法里。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563頁。
4.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569頁。
5.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611頁。
6.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652頁。
7. [俄]尼古拉·斯帕法里：《中國漫記》，蔣本良、柳鳳運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
8.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委託前往耶穌會莫斯科教區的閔明我帶給俄國沙皇一封信函，“這封信寄到伊斯帕甘城，交給耶穌會教士卡羅利·馬夫裡奇·沃塔，卡羅利又把它送到阿斯特拉罕，交給耶穌會士康得拉季·捷爾皮洛夫斯基，後者於1690年3月18日在莫斯科上呈交了此信。”見

宗教大觀

-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2-63頁。
9. 見[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6頁。“柏格德汗通過一位近臣及耶穌會教士湯瑪斯·佩雷拉和斐迪南·維爾比斯特向專使問道……”。前者即徐日昇，後者即南懷仁。
 10.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7頁。
 11. 指斯帕法里。
 12.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二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749頁。
 13.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二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789頁。
 14.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二卷，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792頁。
 15.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3頁。
 16.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45-846頁。
 17. [荷]伊茲勃蘭特·伊台斯、[德]亞當·勃蘭德：《俄國使團使華筆記》，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24-226頁。
 18. [俄]斯卡奇科夫：《俄羅斯漢學史》（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俄]米亞斯尼科夫編，柳若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3頁。
 19.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p.25-26.
 20. 德梅拉·約瑟夫（1669-1748），中文名馮秉正，字端友。法國人，1686年入耶穌會。1702年來華，在廣州學習漢文。1710年協助雷孝思、德馬諾勘畫中國省圖，頗獲康熙帝嘉許，留京，卜居北堂。1748年死於北京。他滿、漢文造詣均深，曾譯《通鑒綱目》為法文，於1777年至1785年分十三卷出版，名為《中國通史》。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06頁。
 21.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p.30-31.
 22.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 37.
 23.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 40.
 24.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 42.
 25.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 190.
 26.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p. 204-206.
 27.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p. 208-209.
 28. [俄]斯卡奇科夫：《俄羅斯漢學史》（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俄]米亞斯尼科夫編，柳若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6頁。
 29. [捷克]嚴嘉樂：《中國來信》，叢林、李梅譯，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42-146頁。
 30. 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39.
 31. Gaubil Antoine.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e Pekini habitae (annis 1753-1756) a R. R. P. P. Gallis Societatis Jesu. Mercurius in Sole visus. Novi Commentarii*, t. V, pp. 473-480. Summa pp. 46-49. Additamentum. *Novi Commentarii*, t. IX, pp. 499-502. Summa pp. 49-53.
 32. Hallersein Augustin. *Mercurius in Sole observatus Pekini Sinarum anno 1756 die 7 Novembris. Novi Commentarii*, t. IX, pp. 503-512. Summa, pp. 53-54. De differentia meridianorum Petropolitani et Pekinensis.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p. 630-635. Summa, pp. 70-71.
 33. Collas. *Observationes Pekini Chinarum institutae excerptae ex litteris R. P. Collas ad Stephanum Rumovski anno 1772 die 5 maii datis. Observationes a p. Dolliero super cometam anni 1769 institutae. Novi Commentarii*, t. XVIII, pp. 647-655. Summa, pp. 62-63.
 34. Cibot P. *Descriptio Phalle quinquanguli seu fungi Sinensium Mo-ku-sin.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p. 373-378.
 35. Koegler Ignatius, Pereyra Andreas, Slavicek Carolus. *Ephemerides planetariae ex undecim annorum. De horis Sinicis et cyclo horario*, Petropoli. 1735, pp. 23-32.
 36. Gaubilus. *Escerpta es Sinensi quaedam description itineris Pekingio per Siberiam versus Chlamyccos Astracanenses facti. SammlugRussischer Geschichte*. IV part, sect 3, 6 Vol. Petropoli, pp.1734-1735.
 37. Incarville. *Catalogue des plantes et autres 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 en usage en Chine. Memoires de la societe Imperiale des naturalists de en Chine*. Vol. III. 1812. P. 103-128. Vol. IV, 1813, pp. 26-48.
 38. Parrenin. *Письмо о Lues venerea в Китае и о способах лечения этой болезни (21-III-1737 г.)*

39. *Circa ritus sinicos*.這是拜耶爾1738年收到的來自巴多明的資料，都是關於中國習俗問題的。轉引自T.A.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88.
40. 關於*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的評論，轉引自前引書。
41.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轉引自前引書。
42. 這四篇文章是《論古代長壽人的生活》(*Essai sur la longue vie des homes dan l' antiquité*) (1772年)、《中國園林》(*Essai sur hes jardins de plaisance*) (1774年)、《蘑菇的種植》(*Notice sur la culture des champignons*) (1775年)、《傘菌》(*Des agaries*) (1777年)，以上法文和“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一節中的拉丁文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李慧老師幫助翻譯。
43. 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88.
44. 關於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詳見柳若梅、龐曉梅(Татьяна Пан)：《中國、俄國與歐洲之間的知識交流》，《文化雜誌》第103期。
45. “凡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都必須和耶穌會教士交往。因為除此之外，他從俄國得不到任何消息，而從傳教士那裡則可以知道不少新聞，而且通過他們可以比較方便、比較確切地打聽到當地的事情；同時還因為他在當地沒有其他的人可以結識，因為只要一結識滿洲人和漢人，他們隔上一個月就會前來借錢，而借到錢後，都不能很快歸還，有時甚至借出去的銀兩一去就不復返了。”[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53頁。
46. [意]馬國賢：《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李天綱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010年第2次印刷，第78頁。
47. [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38頁。
48. [俄]阿夫拉阿米神父輯：《歷史上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柳若梅譯，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35頁。
49. 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СПб., 1824, стр. 65-68.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Эксмо, 2011, с. 382. 伍宇星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50. [俄]阿夫拉阿米神父輯：《歷史上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柳若梅譯，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56頁。
51. 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的檔案資料：ф.7, оп. 1, ед. хр.№39 Письм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миссионера Ферейра.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апковом переплете. 42 л., 1816-1821, 23x24
52. [捷克]嚴嘉樂：《中國來信》，叢林、李梅譯，大象出版社，第121-139頁。
53. [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閻國棟、肖玉秋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頁。
54. 柳若梅：《18世紀俄羅斯人關於中國語言的教與學》，《跨越東西方的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78-404頁。
55. 現該抄本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的Fonds Borgia Chinois Borgia Cinese 收藏中的第485號，包括約8500個漢字。
56. 詳見柳若梅：《俄羅斯漢學家手稿詞典散論》，《辭書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7-138頁。
57.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то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106.
58. Е.Ф.Тимковский (吉姆科夫斯基)，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1820年至1821年經蒙古到中國行記)，СПб., 1824.стр.221-226 269-271.
59. М. В. Ладзыже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1-го декабря 1830-го года. 《中國福音報》(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1910年第7期，第13頁。
60. С. Черепанов, Днев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 1856, смесь. Стр. 150-151.
61. 關於19世紀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遺留財產，詳見柳若梅：《19世紀天主教在華遺留財產與俄國東正教使團》，《行政》(澳門)2012年第1期。
62. [俄]阿夫拉阿米神父輯：《歷史上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柳若梅譯，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56頁。
63. 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的檔案資料：ф.7, оп. 1, ед. хр.№39 Письм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миссионера Ферейра.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апковом переплете. 42 л., 1816-1821, 23*24。





澳門老城區聖彌額爾小堂 · 許恆嘉攝，2019年